

7月15日12点55分,中央书记处原书记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,享年99岁。这引发全国民众悼念如潮,其“改革闯将,实干万里”的形象也引发人们广泛的追思。纪念万里,是向当年的改革家致敬,也是让改革精神薪火相传。

万里:农村改革先锋 被赞“要吃米找万里”

邓小平曾说,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,农村的改革又从安徽开始。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,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着一句话,那就是“要吃米,找万里”。1977年6月,万里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、安徽省革委会主任。他带头打破“左”的禁锢,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,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,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,实行包产到组、包产到户,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,粮食增产,很快吃饱肚子。

视察发现农民穷得“没裤子穿”

1977年,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。在这里,万里带头打破“左”的束缚,探索农村改革之路,实行包产到组、包产到户。

“到任之后,他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。他发现农村很穷,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,吃的是地瓜面。”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厅副主任王相坤撰文称,万里感叹道: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,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。

据媒体报道,万里曾回忆说:“我刚到安徽那一年,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,只有10%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,67%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,40元以下的约占25%,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?”

万里之子万伯翱曾向媒体回忆说,我父亲到了安徽后,对穷的程度还是大吃一惊,去山区看望农民,可为什么老百姓不出来见书记,因为没裤子穿,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,春节农民吃不了饺子。老爷子说,当年杨白劳还借二斤白面,到集上扯二尺红头绳过个年呢,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,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。

在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,

万里说:“必须把生产搞上去,争取今年粮食生产达到一个新水平。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,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和条件都可以,但保证今后绝不能再讨饭。”当年11月,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,制定了《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(试行草案)》,简称农村《六条》,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《六条规定》。

1978年5月13日,《人民日报》一版发表了长达六千多字的题为《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》的长篇文章,署名“驻学大寨联合报道组”。文章批评说:领导态度不明确,群众思想就会乱,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,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受破坏。

《人民日报》前总编辑张广友是万里曾经的下属和好友,在他看来,这是针对万里在安徽搞的农业改革的文章。

万伯翱向媒体回忆说,当时真的是谈“包”色变啊,有群众就拿《人民日报》找万里,问他还坚持包产到户,万里说要是秋后它(《人民日报》)给你粮食你按它说的办,否则你按我的办。万里坦然处之,只要群众吃饱饭,挨批斗就挨批斗吧。安徽被斗了两年多,最终是邓小平的表态才帮助万里完成了改革。

“包产到户”试验开启农村改革

万里调任安徽一年后,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召开党员座谈会,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,实行“四定一奖一罚”的包产到户责任制。1978年9月15、16日,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,1697亩耕地,一夜之间,分给了村民。

“对于这样的大胆探索,万里给予积极支持。”王相坤在文中写道,1979年2月6日,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,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。万里在

会上的发言中指出:“我主张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。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,利大于弊。暂不宣传、不登报、不推广,秋后总结了再说。如果试验成功,当然最好;如果试验失败了,也没有什么了不起;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,也不可怕,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。”

同样是在1978年,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的尝试,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开始。现任小岗村书记吴夕民7月15日接受采访时说:当时的小岗村,是有名的“吃粮靠返销,用钱靠救济、生产靠贷款”的“三靠村”,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十八位农民立下生死状,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。这若是没有万里同志的鼎力支持,是不可能的。

这一年,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,收粮13.2万多斤,相当于1966—1970年产量的总和;生猪饲养量135头,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;卖油料2.4万斤,超过任务的80倍;向国家交售公粮2.99万斤,完成任务的10倍;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。

王相坤在文中写道,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,万里由衷地高兴。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:“你们这样干,形势自然就会大好,我就想这样干,就怕没人敢干。你们这样干了,我支持你们。”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,1980年5月,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:“‘凤阳花鼓’中唱的那个凤阳县,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,也是一年翻身,改变面貌。有的同志担心,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,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。”

1980年4月,万里离开安徽,出任国务院副总理、国家农委主任,全面主持农村改革。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:“要吃米,找万里。”(据《新京报》)

万里之子:父亲要求所有孩子一律不许做生意

1993年3月底,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主动提出要求退下来,此时他77岁,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,过上平静的离休生活。万里对自已离休后的要求是:“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,不问事、不管事、不惹事。”

1993年9月,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大会组委会请万里出席。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:“我在家祝贺第七届全国运动会胜利召开。”由于他本人没有出席,故电视、广播和报纸报道中没有他,很多人感到很奇怪,进行种种猜测。其实,他既没有病也没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,只是不想扰民而已。

万里最反感的就是“扰民”,退休后有时到下面去,当地的主要领导都要来看望他,这让他很不安,他说:“你们都很忙,我现在是个闲人,不要因为看我影响工作。”

退休之后,万里还经常到处走访、参加活动,会见、怀念自己的老战友,老领导们。

万里酷爱各种运动,尤其爱打网球,这可不是说说而已。万里的“网球生涯”起始于1933年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时,而据万里之子万伯翱说,老爷子2012年才挂拍,算一下,球龄有近80年呢。1993年万里从委员长位子上卸任后,闲暇渐多,他一周打4次网球,每次一到两个小时不等。老人家打球时,从来都是轻伤不下火线,几次腿脚受轻伤,生怕影响打球,他是能忍则忍,能扛则扛。

在次子万仲翔的心目中,父亲万里太无私,对家人的要求非常严格。

人们常说朝中有人好做官,万里认为朝中有人难做官。他曾对子女们说过:“通过你们办事,能成的也不能让它

成,如果都成了我们家不就成衙门了。”万仲翔曾撰文称,“父亲当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之后,对我们要求更严,所有孩子一律不许做生意。父亲从不护犊,我们如果有违规犯法的事情,肯定是要加罪的。”

退休后的万里,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陪家人上,体现出了温情的一面。每到周六,他都亲自张罗厨房做好饭菜,等着儿孙们回来聚首。

万里和夫人边涛金婚时,他特地让全家团聚,一起庆贺,这使夫人特别高兴。可对于他自己的生日寿诞,却办不了什么酒宴。说起他和边涛60多年的笃爱深情,老战友们常对他乐呵呵地说:“这么多年过去了,你们真是模范夫妻,典型知音!您呀,是模范丈夫啊!”每听到这样的话,万里就自豪地开心而笑。(本刊综合)

悼念万里,向改革家致敬



万里是党内元老,他的生平事迹有很多东西可写,有很多值得总结。而人们印象最深刻的,是他1977年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,将小岗村创造的“联产承包责任制”或曰“包产到户”的经验推向全省,从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大幕,也拉开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大幕。

改革之于今日中国,是一项社会共识,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却充满争议,要受到“一大二公”的政治观念掣肘,冒巨大的政治风险。万里主政安徽时,经过深入调研,推动安徽省委出台“省委六条”,明确“以生产为中心”等,实行以组包产,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。这些改革举措广受拥护,万里也被认为,为推进农村改革贡献了扛鼎之力。

万里被民众悼念,正是因其当年的改革锐气、闯劲。他对农村包产到户的推进,对中国民主法治的推进,都灌注了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勇气。当下,改革这一关键词贯穿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图谱中,今年中国更是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。在此情境下,纪念万里,是对其政治人格的景仰,也是对老一代改革家改革精神的追思。珍视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,也能为时下的改革找到历史刻度。

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的语境下,有险滩待跨、有硬骨头待啃。这与30多年前改革开放时面临的一些情况相通:要继续发展,就需要破除长期积累下来的体制机制弊端,需要触动一些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。当年以邓小平、万里等人为代表的改革家,甩开了膀子、迈开了步子,开启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辉煌。敢闯敢试,敢于突破思想观念、体制机制上的条条框框,这是万里的“改革促进派”风格,也是最值得后来者学习的地方。

“闯”不是蛮干,而是要实事求是,其现实立足点就是在民主法治框架下干实事。万里给亿万民众留下“改革闯将”的形象,而其精神实质就是遵循规律干实事。他之所以“闯”,是要解决其责任范围内所面临的问题,而他最终也“想干事、能干事、干成事”——“联产承包责任制”对生产力的解放,也会永久载入历史。(据人民网)